

※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※

溯源紀行

戴璉璋

我童年的記憶是片斷的，卻仍清晰而溫馨。那時家住松陽古市，父親經營一家商號，頗具規模，須雇請伙計協助才能忙得過來。店前人來人往，棧房堆滿貨物；母親則在內屋忙著料理家務。我穿的鞋、帽都出自她的巧手，冬天棉帽上的虎頭刺繡即是她的得意作品，我戴在頭上跑來跑去，自己覺得威風凜凜。

我六歲在古市上小學，這時日軍侵華，大局已不安定。第二年，父親結束古市店業，全家搬回麗水碧湖，遷徙幾處後，定居瓦窰埠。我祖父、叔公都住這裏，大概是曾祖父選定的安居之地。我家在甌江中游，俗稱大溪的北岸，臨溪有一淺井，母親在這裏取水的身影，一直留在我心中不會消褪。大溪平時水不很深，卻是松陽、遂昌通向溫州的水運要道，經常有竹筏在這裏航行。假日我徜徉在溪邊灘上，望著長排的竹筏從上游浮來，又向遠方漂去，對於溪流的源頭有無窮想像；對岸青青的南山，也總是吸引我，好奇著那裏究竟蘊藏些甚麼。這時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溯溪而行，尋找源頭，或攀登南山，俯覽大地。有一天，我真的沿溪向上游走去，越走越遠，越走越新奇，卻也越陌生，直到天色暗下來，才不得不悻悻然折返。這個未完成的願望，從此潛伏心底，時或左右著我的生活走向。

中學念的是當時設在碧湖的省立聯合師範。抗日戰爭，使得大家生活倍極艱辛，但人人都鬥志昂揚。同學們不論寒暑，一大早即散布在學校周邊的農田、墓地，朗誦課文，晚上則在暗黃的燈光下，專注地做著功課。國難當頭，青年們唯一的志向，就是保國衛民。抗戰勝利後，學校遷回杭州，復名省立杭州師範。於是我須離家遠行到杭州去繼續學業。出發前，母親千叮萬囑，教導我如何料理生活，如何待人處事。臨走時，父親陪我到南山車站坐車，母親則在家門口，抱著妹妹，不捨地望著兒子離去。我離家獨自遠行，感到不再有父母可以依靠的惶恐，同時又頗

有溯溪一探究竟的興奮。事實上父母親的愛心，一直是我生命最深的扎根處。我離家後到處漂泊，險阻重重，最大的支撐力量，全自父母。每當我彷徨無助，怨天尤人時，「不能讓父母失望」的聲音就在心中響起，於是頭腦清醒了，方向清晰了，咬著牙，繼續前進。我常捫心自問，一生行事還能守住誠實待人、認真做事的原則，這都得歸功於雙親的身教、言教。

杭師在西湖邊，與「柳浪聞鶯」只隔一條馬路。我們這些初進省城的窮學生，驚訝於都市之大，湖山之美，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處可以開眼界的地方。憑藉年輕人的腳力，走遍了白堤、蘇堤，也參訪了雷峰、靈隱。可是生活的另一面向卻很快地抑制了我們的遊興，這時政局動蕩不安，學潮此起彼落。課餘讀著《彷徨》、《吶喊》、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的我們，總是生活在不滿現狀，反對貪腐的激憤之中。於是，湖光山色被遊行口號所掩蓋，檢討老師，責怪校長成為日常大事。就在這樣混亂的氛圍中，我結束了杭師學業。

一九四八年暑假，拿到畢業證書的同學有的高高興興回家，有的則到處托人幫忙找工作。父親來信說家鄉很不平靜，要我留在杭城找事做。没有任何人事關係的我，困守杭師宿舍，一籌莫展。暑假快結束時，有一天在校門口會客室遇見一位中年女士，自稱是小學校長，要徵聘兩位教師。我與她交談之後，就把工作決定下來了，並答應再邀一位同學去她那裏。回到宿舍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謝雲飛兄，他欣然同意與我一起去教書。於是我們就成了杭縣五杭鄉中心小學的教員。這裏學生不多，全校分為三個班級教學，我與雲飛分別教高年級與中年級，另有一位女老師教低年級。教務、訓導由我與雲飛負責，總務則由校長兼理，她手下有一位女工友，包辦校舍清理及教師伙食工作。據說校長的先生在杭城養病，那邊要她費心照顧，於是學校的日常事務就交付我們三師一工來運作，她按時發薪，偶而也買幾本新書給我們看看，心情好時也帶我們到附近鄉村郊遊。就這樣，大家也算相處融洽，能和諧共事。年底學期結束時，雲飛的小叔賡新兄來五杭。賡新與雲飛同年，與我則是小學同學，他在南京空軍總部工作，穿著一身美式軍裝，配上大皮靴，讓這裏的鄉下人為之側目。談起時局，大家都是憂心忡忡，幣值不穩，物價飛漲，北方多處都已變色，流亡學生一批批南下，令人感到江南也岌岌可危。賡新說空總打算遷到臺灣，他的工作單位目前還有些缺額，要加入應該沒有問題。我們翻看地圖，臺灣，一個處於東南海隅的小島，中央有山脈縱貫，東西兩岸則建有鐵路。這裏離戰火較遠，可能是亂世中的淨土。於是懷著走向不可知之未來的心情，我與雲飛辭去

教職，隨著賡新直奔南京。經由他的引薦，我們順利獲得了上士文書職位，加入空總，坐船來到臺灣。在臺北安頓下來後，才寫信稟告父母。據妹妹後來告知，當時雙親讀信，心情大亂，竈上煮的一鍋粽子都燒焦了。

局勢急轉直下，大陸政權更換，兩岸處於隔海對峙，連書信都無法來往了。這樣的情勢，頓時讓我感到有家歸不去的苦楚。個人生命原來這樣藐小，無奈，離家遊子就像一片脫離枝幹的落葉，任由巨風吹來吹去，不知將飄向何方。在蒼涼無助的處境中考慮到眼前這抄寫公文的工作，終非長久之計，當同事告知鐵路局招考機務練習生的消息時，我與賡新兄就前去報考，結果兩人都被錄取。我分發到宜蘭機務段，賡新分發到臺北，後來他也調到宜蘭來與我共事。雲飛則向省府申請教職，被分發到桃園一間小學教書。

所謂機務段，是負責調配及維護列車動力系統的機構。當時臺灣鐵路使用蒸汽機車，每車配置司機、司爐各一人，練習生是司爐的儲備人員，協助司爐清理鍋爐到炭渣、機件的油垢等工作。我在宜蘭機務段車庫裏，整天在機車裏外上下鑽來鑽去，跟炭渣、油污打交道，衣服成了油布，混身沾滿泥灰，頗自得於勞工神聖，期待自己能有一技在身。數月後，通過測驗，我進入鐵路局員工訓練所，接受司爐技能培訓。訓練所在臺北中崙，第二女中附近。看到學生們穿著制服，背著書包，清純可愛，非常羨慕，夢想自己還能再過正規的學生生活。回宜蘭後，我成為「見習司爐」，開始登上機車，跟資深同仁學習實務。行車期間，司爐的主要工作是鏟煤入爐，必須使爐床上的煤炭分布均勻，這樣才能有旺盛的火力，燒出足夠的蒸汽，牽引列車行駛。臺鐵宜蘭線，隧道多且長，貨物列車又常在夜間開動。我開始過日夜顛倒的生活，總是睡眠不足，鼻腔則被燻得像煙囪。這時雲飛已經進師範學院深造，受到他的鼓勵，我開始收集一些參考書，利用行車休息時間，隨時閱讀，恢復往日學習的記憶。

一九五一年八月，我幸運地被臺灣師範學院（後改為臺灣師範大學）錄取，進入國文系就讀，恢復了難得的求學生活。師院是公費待遇，我以校為家，可以專心向學。受到政局巨變的刺激，當時校園瀰漫著一種憂患意識。大陸來臺的師生，多數都是經歷千辛萬苦，顛沛流離地從戰火中掙扎過來的，現在暫獲喘息，就會追問：何以如此？下一步該怎麼辦？國家命運如何？民族文化發生什麼問題？有人從歷史中去探究因果，有人在思想上去尋找答案。教授們在教課之餘，常受社團邀請，開設講座。如陳致平師的「中華歷史故事」、潘重規師的「論語」、牟宗三

師的「人文友會」，都吸引著校內外的很多聽眾。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「人文友會」。我一年級就修牟師開的課：「邏輯」與「哲學概論」，三年級又修他的「先秦諸子」，四年級則有他教的「中國哲學史」。「友會」是我升四年級時開始的一種課外講習活動。宗旨是要藉此扭轉五四以來鄙棄傳統文化的歪風，而由向內向上開啓理想性，契接先聖先賢的生命與智慧。牟師希望每人要有一定的研究工作，閱讀相關書籍，參與討論，凝聚心志，開發思路，經由述作而有貢獻於學術文化。「友會」每兩周聚一次，每次都有討論主綱，大致涉及時代的課題、文化的省思，以及中西哲學的重要內涵。先由牟師主講，然後開放討論。這樣的講習活動，對於我這個浮沉於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激流中，不知何去何從的人來說，每次都如是醍醐灌頂，既開拓了知識領域，也培養出批判能力，確認了自己學術志業的精神方向。當然大學四年中，開導我的良師不只是牟師一人，如許世瑛師、屈萬里師都也使我受益匪淺，對我的學術生命有決定性影響。但牟師指引我的卻是歷史文化的源頭活水，溯源而行，成為我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的志業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到新竹中學教書，隔周一次仍回臺北聚會。一九五六年，牟師應東海大學之聘，離開師大，「友會」乃因而停止講習。

在竹中教書時，我嘗試從事《孟子》研究，始終只能做些文字訓詁的工作，思想義理層面則缺乏功力，無法展開。牟師轉往香港大學執教時，我曾經興起追隨他到香港進新亞研究所讀書的念頭。新亞有錢穆、唐君毅兩位名師，牟師在那裏兼課，後來又有徐復觀先生加入，儼然成為當代新儒家重鎮。我雖然心嚮往之，終因諸多現實問題，而無法如願。於是改變念頭，回母校國文研究所就讀。這裏的治學門徑，偏重文獻學研究，從語言文字入手，大致承襲清代考據學風。大學時代，我修過許世瑛師的「讀書指導」、「國文文法」及「聲韻學」，在語言文字方面有些基礎。四年級時，臺大教授屈萬里師來師大開課，講授《尚書》，我在他班上領教了文獻考據的嚴謹態度。因此我的碩士論文選擇做「尚書文法研究」，請許師指導。

讀研究所時，我在臺北第二女中兼課。一天，遇到在臺南教書的大學同窗唐亦男，她托我向師大圖書館借一本《莊子校釋》，留下她妹妹亦璋的住址，要我借到後交給亦璋轉寄。亦璋也畢業於師大國文系，低我五屆。這時她在臺北第一女中教書，寄住雲和街師大教職員宿舍，照顧半身不遂的龔慕蘭師。我送書去那天，她穿一件唐裝棉襖，令我印象深刻，再加上照顧龔師的義行，使我感到她有一種超越世俗的氣質。於是常去雲和街找她，交談中發現彼此原來同是「天涯淪落人」。她

們三姐妹在父母過世困處重慶時，靠著身為空軍機械官的二哥一張眷屬機票來到臺灣。亦璋插班初三，再考上新竹師範，畢業後教了三年書，又努力考上師大。過程曲折艱辛，全憑一股奮發向上的精神、堅強的意志力，闖過種種難關。我敬佩她的志氣、才識，告訴自己：「找到了可以攜手同行的終身伴侶。」一九六一年秋天，亦璋寄住的房子，被颱風吹壞，漏水嚴重。我商請一起在二女中教書的同窗好友朱守亮兄幫忙，他一家三口，住二女中宿舍，清出一個小房間，可給亦璋暫時棲身。到十一月十二日，我們結婚，就有了自己的眷屬宿舍。

一九六二年女兒祖寧出生，我也拿到了碩士學位。這時許師在淡江文理學院（後改名為淡江大學）主持中文系。這個系是他一手創立的，正需要人手。於是我與亦璋在他安排下一起進入淡江教書。養兒方知父母恩，看看祖寧活潑可愛的模樣，對父母親的想念也與日俱增。我與他們已有十多年不通音訊了，情況未明，貿然去信，唯恐給他們增添麻煩。特別是妹妹還在求學階段，萬一因為「臺灣關係」而致影響她的前途，那我真是罪不可赦了。不過這時老家在閩、廣一帶沿海地區的人，已可以經由香港開始通信，我也忍不住有試探看看的心意。亦璋有位好友，是香港來的僑生，她回港度假時，我們托她代轉家信。事後天天忐忑不安，計算著郵件的日程，揣測著可能結果。很幸運地不久就收到雙親的回音，知道他們都平安，妹妹麗珍則已升入醫學院讀書。這真是一大喜訊，衷心感謝上天宏恩。我雖不是教徒，但從此常懷著一種感恩的心，總是珍惜老天爺給我的種種恩賜。

淡江教課雖忙，但我並未放棄學術研究工作，在許師指導下繼續從事漢語語法史的探本溯源，從周初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，到上古的甲金文，逐步地分析、比較，希望掌握到各期特徵及其歷史流變。這方面的論著，陸續發表在《淡江學報》，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（簡稱「國科會」）獎助。我在淡江有一門「中國哲學史」課程，戰戰兢兢，花了很多時間來備課，讀了不少參考書，教學相長，自有些長進。

一九六六年十一月，兒子祖達出生，家裏多了一位寶寶，頓時熱鬧許多，但也讓我們忙得喘不過氣來。亦璋勞累過度，染上腎結核，須動手術。我一直記得她住進醫院時，她靠著門口看我帶女兒離去的表情。我則強忍眼淚趕回淡水宿舍，家裏還有一個襁褓中的孩子在哭鬧著，年輕的傭人實在拿他沒辦法哩！

好不容易熬過一段艱苦歲月，有一天許師告訴我說師大國文系程主任要他問我，願不願意回母校教「文法」。因為師大班級增加，日間部之外還有夜間部，許

師一人忙不過來，而在研究所中寫文法論文的又只有我。在許師的鼓勵下，一九六八年秋，我回師大兼課，第二年改為專任，而在淡江則變成兼任。

一九七二年，教育部改編國（初）中國文課本，聘請屈萬里師任編審會主任委員。屈師要我參加編輯小組，與臺大的張亨兄、政大的應裕康兄負責編輯實務。我們三人小組決議，讓課本回歸語文教育本位，把政治性選文減到最低限度；並且在每篇選文之後，增列「問題與討論」項目，藉以活化教學方式；又另編《教師手冊》提供參考資料。這些措施都被後續的編者接納，在當時卻是具有開創性的。一年後，應、張兩位陸續退出編輯小組，改由臺大吳宏一兄與我合作，完成全部教材編寫後，又繼續做修訂工作，先後為此忙了十年。

我在師大也教「中國哲學史」。韓籍學生梁承武來修博士學位，要我做他的指導教授。他常與我談起中、韓朱子學研究的情況。韓國李朝時代（約略相當於中國明代），有位弘揚朱子學的大儒李退溪，在韓國思想史中具崇高地位。他的後人李東俊曾經是實業鉅子，如今接任韓國退溪學研究院理事長，大力推廣先人學術。他知道牟宗三師在當代中國哲學界地位崇隆，宋明儒學的巨著《心體與性體》對朱子學的析論尤具創見。目前牟師已自新亞退休，回臺任講座教授。李東俊先生來臺北，通過梁承武要我陪同拜訪牟師，表達邀請訪韓誠意。牟師本不願遠行，李先生說：「我們在韓國弘揚你們儒家思想，你怎能不關心呢？」牟師乃欣然同意，由我與承武陪同，在一九八〇年七月起程訪韓。先到漢城（今「首爾」），依朝鮮古禮恭謁孔廟，然後參訪以弘揚儒學為主的成均館大學。晚間又與韓國哲學會成員座談，與談者都是各大學的哲學教授，他們提出東西方哲學文化方面的種種問題，由牟師一一解答。意猶未盡的人，我建議他們可以參看牟師的相關著作。第二天李東俊與他兄長分乘兩部專車，陪同我們赴安東訪問陶山書院，退溪當年在此講學，如今仍是退溪學研習中心。書院座落山間，環境清幽，氣象高雅。據說韓國許多書院仍保持民間講學的活力，這讓我不感到羨慕。離開陶山後，轉往慶州遊覽。慶州曾經是新羅國首都，還保留些古蹟，這裏的佛教大廟，與漢城到處可見的基督教十字架形成了鮮明對比，反映出韓人宗教信仰的演變。第三日我們到大邱訪問啓明大學。啓明與臺灣師大是姐妹校，多位教授有師大學位。校長是留德博士，他雖專攻科學，言談間對中國文化卻表達崇敬之意。這不是一般應酬上的客套，事實上韓國社會所保留的華夏文明，有很多在中國境內都難得見到了。一般而言，他們待人的禮數就比我們講究，嚴守長幼有序、尊師重道的規矩。校園中學弟妹對學長都是

唯命是從的，對師長的禮貌也保有古風。走在街上，舉目所見雖然全是韓文，但學界來往，簽名題字仍慣用毛筆。退溪研究院幾位理事送給我的題辭，全是《四書》的句子，書法也都有相當水平。這次訪韓，李東俊先生送給我一函線裝的《退溪全集》，要我每年都來參加退溪學研討會。

一九八一年，是退溪誕辰四八〇週年，我受邀去漢城（首爾）開會，發表論文。一九八二年，臺北成立退溪學會，並主辦國際會議。八三年，退溪學研究院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合辦研討會，地點在美國波士頓哈佛校園。我去開會，遇到多年未見的哈佛教授杜維明兄。他告訴我，新加坡要在中學推行儒家倫理教育，需要人去協助他們編寫教材及培訓師資，他問我願不願意去。我說一九八五年在師大休假的時候可以去看看。一九八四年，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來函邀我去作一場演講。這一年的退溪會是在德國漢堡大學舉行，於是我就先到新加坡訪問，然後再趕到漢城（首爾）加入退溪學研究院團隊，遠征德國，參加會議，發表論文。

一九八三年，可說是我的幸運年。這年暑假，我以香港新亞書院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名義，可以在香港作長時間的停留。於是妹妹麗珍與妹夫柏彬就安排父親來港團聚。我離家三十六年，與父母通信一直戰戰兢兢，斷斷續續，偶爾匯一點錢，還要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執教的雲飛兄轉寄。母親晚年被病痛所苦，我雖焦急，卻無能為力。她臨終想與兒子見一面的心願，竟成為無法完成的憾事。我在臺北十普寺為她誦經，也不能稍減內心深沉的愧疚。如今父親以七十四高齡，長途跋涉來與我相見。我既感激上天的恩寵，而私下也總在擔心害怕，以當時的交通狀況，從麗水到香港，不知要轉幾趟車，旅途折磨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老人家受得了嗎？而我的家鄉話因為長期未用，如今連半句也想不起來了，到時候父子見面，怎麼順暢溝通啊？就這樣，在約定見面的前兩天，我既興奮又不免憂心忡忡地來到香港。我指導論文的學生岑溢成弟做了很好的安排。他是我父親與妹妹入境香港的保證人。他在彌敦道為我們訂好旅館，見面那天一早就陪我到紅磡火車站等候。深圳來的列車，一班班到達，旅客一批批散去，我緊張地盯著出口望，生怕錯過兩位親人。直到黃昏時刻，才看到麗珍攙扶著父親緩緩走出來。我興奮地衝過去，抱住老人家，高興得說不出話，而父親雖然疲憊，也面露微笑盯著我看。骨肉團圓的美夢居然成真，似乎還不太能相信。吃過飯在旅館住定之後，妹妹才告訴我，他們是在羅湖辦入港手續時被卡住了。辦事人員打電話到香港確認保證人時，溢成家中沒人，一直到下午，溢成太太回家了，證實保證之事，他們才放人。這一折騰，父親又急又氣，

又餓又累。我聽了真是愧疚萬分，不過親人見面總是高興的。老人家似乎已經忘了旅途的辛苦，凡事好奇地細問我的種種際遇，也滔滔不絕地敘述老家的情況。第二天早餐過後，父親問我旅館的費用，一聽到我說的數目，竟比麗珍的月薪還高，就堅持要換一家便宜的。我說這只能算中等水平，再便宜的，恐怕衛生、安全都不合適。老人家卻宣稱，如果不換，住三天就回去。我只得再找溢成商量。溢成跑到中文大學教授黃慶萱兄那裏告訴他我的困境。慶萱兄是我師大同窗，他慷慨地伸出援手，把自己的中大宿舍分兩間給我們住。好在他的妻女都在臺北，並不常來香港。仰賴慶萱兄的大力協助，我與父親、妹妹才能在香港團聚三個禮拜。麗珍有位同鄉好友在香港定居，我師大學生有溢成、還有他妹妹寶嬋及廖英慶，在他們熱心相助下，我們在港無論購物或遊覽都很順利。好時光總是過得很快的，父親居港期限轉眼就到了。送他們上了去廣州的火車之後，望著車子轟隆轟隆開走，內心黯然。親人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？相見為什麼這麼困難呢？一九八五年我到新加坡工作時，曾想接父親來獅城相聚，但是考慮到南洋氣候太熱，我的工作壓力大，而亦璋、麗珍也都有職務在身，無法前來幫忙侍候老人家，再次團聚的心願，終未實現。

一九八五年我在師大休假，八月間應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之聘，來獅城工作，職稱為高級研究員。我提的計畫是「易傳研究」，除了自己讀書寫作之外，還參與他們教育部「儒家倫理」課程小組的工作，協助他們編寫教材。此外，無論是大學或民間社團召開與儒家有關的研討會時，總要盡義務去發表論文。新加坡深受英國影響，重視制度與效率，我向師大繼續請假一年，才完成預定工作。離新回臺前夕，東亞哲研所所長吳德耀先生勸我留下來，他說所方願意與我簽長期聘約，保證可以工作到六十五歲。他們一般公務人員是六十歲退休，可以做到六十五，算是特殊優惠了。我與亦璋商量結果，還是決定回師大復職，不過答應與吳所長合作，編寫一套可供海外華人研讀的《儒學輯要》。我負責選材與注釋，他負責譯為英文。回臺後，我找岑溢成及楊祖漢合作，從事《輯要》的編著。這時他們兩位都已在臺北的大學教書，另外與朋友共同創辦了《鵝湖》雜誌，闡揚當代新儒家思想，對青年學生頗具影響力。一九八九年六月，北京發生天安門風波，震驚全球。新加坡領導階層，因此政策大轉彎，把「東亞哲學研究所」改為「中國政經研究所」。我們的《儒學輯要》計畫被凍結，忙了兩年的工作成果，也被擱置在他們的檔案中。還算幸運的，是我在東亞哲研所完成的專著《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》，已由所方在一九八八年出版，一九八九年初，吳所長又授權給臺北文津出版社在臺灣發

行。這一著作，後來讓我獲得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。一九八九年，師大「學生綜合委員會」做了「教學意見調查統計」，我在國文系中得分最高，被評選為「教學特優教師」。多年的辛勤耕耘，如今總算稍有收成。

一九八九年十月，韓國退溪研究院與大陸孔子基金會都在北京召開學術研討會，時間先後相連。我應邀出席兩會，發表論文。孔子基金會在北京會後，還安排了山東曲阜之行。我們與會者由專車送到目的地，恭謁孔廟，參觀孔府、孔陵。古老的建築，悠遠的傳統，處處顯示中國文化的深度與高度；而碑碣的破損，則透露了「文革」的荒謬。亦璋與我同行，我們還登上了泰山，領會了東嶽的氣勢。這是我離開四十年後首度踏上大陸土地，當然要回老家看看。與妹妹相約在上海見面，乘坐麗水對臺辦公室的車子回麗水。第二日到碧湖祭拜雙親墳墓，探訪他們的故居，廚房裏碗櫥、水缸還在，臥室桌上還可以找到幾頁墨跡，內心百感交集。我為子不孝，幸虧有妹妹、妹夫在雙親身邊照顧，他們才不至於太苦。此行還拜望了舅父與姑母，親人相會，恍如隔世。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也是在一九八九年正式成立的，吳宏一兄受聘為主任。他與我長談規劃文哲所的種種構想，並邀我擔任諮詢委員。可惜繁重的籌備工作使他健康受損，到一九九二年乃因病辭職。諮詢委員中，丁邦新、余英時兩位院士，向吳大猷院長推薦我來擔任。丁、余兩院士都在美國教書，與我只是在一些學術場合見過幾次，居然對我信任有加，他們一向大力支持文哲所籌設工作，我對當前文學、哲學研究也與他們有相同的想望。就在他們的鼓勵之下，我離開了師大教職，朝九晚五地到中研院為文哲所盡心竭力。

五四文化運動以來，學術界受到西潮衝擊，瀰漫著一種泛科學的思維，影響所及，文學、哲學研究也只局限於文獻考據方面。嚴格的實證主義，排斥了傳統的感興覺悟領域；求「真」的工作被無限放大，阻塞了求「善」求「美」的途徑。於是文學的情理興會、哲學的形上感悟，都被判為主觀想像，由此而有的論述，則是屬於不可證實的、非認知的，當然也該是被鄙棄的。當代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先生與他的弟子們：唐君毅先生、徐復觀先生，以及牟宗三師，在這方面都有深刻的反省，提出睿智的主張。我贊同他們的見解，認為重振人文思想，上契文化慧命，才能開發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，使當前遭遇的種種問題，得到善解。所以我在文哲所第一個規劃的工作就是「當代儒學研究」。這個計畫在中研院一些實證主義者那裏，引發了不少質疑，也遇到了一些阻力。我據理力爭的結果，只取得了試行一年的經

費。於是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劉述先兄共同主持，加上所內相關同仁，大家全力以赴，交出亮麗的成績，才爭取到可作長期研究的資源。持續十年多的努力，終於使文哲所成為當代儒家研究重鎮，吸引了國際學界的目光，使當代新儒家思想成為當今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。海峽兩岸、日、韓、新、馬、越南、歐、美都有學者來作訪問研究。所內同仁則發展出以中、日、韓為主的「東亞儒學」專題，及以中、歐為主的「跨領域哲學中的儒學」專題，都是國際性的合作計畫。把儒家思想推向國際論壇，在與各方對話之中，豐富彼此內涵，提升世人智慧，已是文哲所義不容辭的任務。文哲所的研究工作，當然並非限於儒學這一項，文學、經學也都各自有其重點，並且成績也深獲贊許。我個人後來又走進魏晉玄學領域，王弼、阮籍、嵇康、郭象、僧肇，以及唐初的成玄英，這些人都有才情、高致，引起我很大興趣，而詮釋他們的言論，在當代又是極大的挑戰。很多人往往視之為不合邏輯的詭辯，或無益於實際的清談。其實這裏有深刻的智慧，必須追溯到他們的玄智，體察其所關照的玄理，才能相應地領會他們的論述在人生修為、文化發展的意義。我一家一家地探索，成果都發表在文哲所《集刊》上面，一再地獲得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。在二〇〇二年我退休前夕，結集成書，名為《玄智、玄理與文化發展》，交由文哲所出版。

我在文哲所任職十年，前五年負責行政工作，事務的干擾，人情的壓力，都未能影響我當年參與籌設這個所的初衷。堅持學術獨立的精神，依理行事，是非分明，這是我自己感到欣慰而且也受到同仁肯定的作為。一九九七年交出行政工作後，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。我把重點移到先秦儒學，企圖通過孔門對六經的解讀，來抉發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。當世人熱衷於宣揚儒學，而又往往各說各話時，這種探本溯源的工作特別重要。這工作並未因為我在文哲所退休而停頓，如今已寫出樂教與易教的論文，祈求上天給我充裕的時間，能完成這個願望。

我是二〇〇二年七十歲時在文哲所退休的。退休那日，所內同仁為我舉行一個儀式，邀請李遠哲院長致意。我的女兒祖寧與兒子祖達全家都從美國專程回臺參加，我的許多學生也紛紛致辭。最後還要我作一場學術演講，整個過程隆重而感人。

退休後居家的日子增多，我與亦璋彷彿又回到四十年前成家當初的歲月。但畢竟不一樣了，我們已進入老年，兒女也都各自成家立業。祖達一家住美國東岸紐澤西，他是計算機系統工程師，媳婦還在修音樂博士，他們有兩個孩子，在念小學。

祖寧一家住美國西岸舊金山，她是生物科學家，女婿為電機工程師，他們的女兒已上大學，兒子則在念高中。過去總是我們兩老去看他們，如今不耐長程航行，改由他們來看我們。去年（二〇一一年）八月，亦璋召集他們兩家在杭州見面，同時也邀請麗珍全家，於是就有了三代十八人大聚會的盛況。面對西湖美景，看著孩子們蹦跳嬉鬧，自己也變得年輕了，內心滿溢幸福之感。生命不就是這樣嗎？如同江河，一波接著一波滔滔前行。當然江河之所以滔滔不絕，在於他有源頭活水，就人來說，無私的愛心，應當就是那不息不已的源頭靈泉吧！

——本文原刊於唐宗龍主編：《血濃於水赤子情：麗水籍在臺鄉親小傳》（香港：銀河出版社，2014年3月），頁1-20。

